

1 阿尔巴尼

阿尔巴尼位于皮卡迪利大道旁一间小小的马车房背后，哈切兹书店和福特南与玛森百货公司的对面。它建于十八世纪晚期，是那些在乡间有自己的地产又想在城市里有一个落脚点的有钱人的住处。在通向花园的狭长大厅里有一座拜伦的胸像，1816 年他曾经在这里住过。墙上还挂有饰板，纪念墨尔本勋爵、埃尔顿勋爵大臣和帕默斯顿子爵等维多利亚时期的知名人士。英国所有清一色由男性成员组成的机构——公立学校、牛津和剑桥各学院、伦敦的俱乐部以及律师学院——都有一种家族相似性，阿尔巴尼也属于这个家族：高高的走廊简朴肃穆，带着冷冰冰的味道；脚下是闪烁的嵌花瓷砖；墙上高挂着磨光的墙板，开列着上至 1799 年的历任管理委员会秘书长的名单。

沿着在花园中蜿蜒而过、为枝叶所掩蔽的木板小径走到尽头，就来到了伯林的房间。透过窗框，在层层窗帘之间，可以看见绅士们在客厅中喝茶。伯林终其一生都是在这样的地方度过的——在带有英国机构特权痕迹的高墙拱卫的花园中，以及有着高高落地窗的房间里。

给我开门的是伯林本人。他没有拒绝我用俄国人的方式吻他：两边脸颊各一下，然后再来一下。这算是对我们共同的俄国血统的声明，我每次来的时候和走的时候都会很郑重地这么做。他永远穿着那件朴素的深色外套，里头是扣上纽扣的背心，再配上一

条翻边的裤子。衣服样式保守，料子却是上好的精纺毛料。他的黑色系带皮鞋擦得很仔细，由于年深日久而有了细微的裂纹。他一般总扎着一条带黑便士邮票图案的领带。他的背心口袋上挂着一根链子，链上吊着一副长柄眼镜般的玳瑁放大镜，用来加在眼镜外面阅读小字体的文章。

他把我领进了一间舒适的屋子，从这里能看见外面的小径，墙上挂着一套精致的十八世纪法国铜版画。壁炉架上摆着一排凸印着姓名的精美请柬。他慢慢地在壁炉旁边一张破旧的白色安乐椅里坐下。电话在他的肘边不时响起。每当电话响时，他都会重复一遍同样的动作。先是咕哝着：“好的 好的 请稍等。”然后把电话夹在脖子和肩膀之间，从背心口袋里掏出记事本，把眼镜推到眉毛上面，把夹鼻眼镜架在鼻梁上，翻着记事本，稍加考虑，然后说：“星期三下午三点。”在记事本上潦草地划几笔，重新把本子放进口袋，放下电话，这才眨眨眼对我说：“我们说到哪儿了？”他的社交网远至耶路撒冷和华盛顿，既有同龄人，也不乏忘年交，包括学术、出版、政治和艺术等各界人士。现在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来与他的社交圈中的阴谋、戏剧、争吵与和解保持同步。

他面前的咖啡桌上摆着一溜盛着盐腌杏仁和一种芬兰式脆面包的罐头，他在出席晚宴的时候就把它们装在衣服口袋里兴高采烈地带去。在离他的椅子最近的书柜上堆着一大堆巧克力。他嗜吃零食，坐着的时候身子前倾，右手在那堆罐头里翻来找去，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把坚果和巧克力往嘴里扔。他的左臂则弯曲着，挨近身体。

在罐头们的旁边总有一本刚出版的书，一般是某个以前的学生的作品。他叹着气说：“我现在什么也不读了。”还有他自己的一大堆手稿，经过他的编辑亨利·哈代的修订，正等着他做出反应。（“我连自己写的东西都读不下去，更别提其他人的了。”）不过，每

天早上他都会如饥似渴地细读《泰晤士报》。讣告栏里，一张张面孔仿佛还在注视着人们——某位上议院司法议员的夫人，物理学教授，还有一次是他爱过的一个女人^①。他的目光在她脸上流连：“她虚伪至极。虚伪至极。可是又可爱至极。”然后摇头道：“到我这样的年龄，所做的一切好像就是参加葬礼。”我用揶揄的口气告诉他，在巴黎人们说：“Mais Berlin est mort, n'est-ce pas?”（法语：可是伯林不是已经死了吗？）他微笑着回答：“可能是吧。”

在三十年代的照片里，漫步于马格达伦花园或是站在全灵学院方庭中，为一道斜斜的光线所照亮的伯林，身材微胖，肩膀不宽，穿着三件套，一头黑色的鬍发，黑眼睛，戴着厚厚的眼镜，右手托着左肘。他总是不正面对镜头，或是摆出假装严肃的姿势。和他相识最早的老朋友们说他几乎没有变。斯蒂芬·斯彭德对我说：“一头小象，始终是同一头小象。”^②在1910年里加一位上流社会摄影师为他拍下的最早的照片里，年仅一岁的他已经有了一双惹人注目的眼睛——又大又黑，顽皮而聪明，总有一种愉快的表情。身为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中受宠的独子，他始终保持着这种与生俱来的信心。八十七年后注视着世界的仍然是同样的目光。

他说话快得出奇，不熟悉他的人根本听不懂。约瑟夫·布罗茨基曾说过，伯林讲的英语跟他的俄语差不多，只是还要快，“简直像在追赶光速”。^③他说起话来就像一只炉子上的俄国茶炊，咕噜咕噜，喋喋不休。弗吉尼亚·伍尔夫1933年12月在新学院的一次宴会上初次见到伯林，她说他外表像个黑黝黝的葡萄牙籍犹太人，说

① 他指的是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本姓道格拉斯。见第8章。

② 根据对斯蒂芬·斯彭德的访谈，1992年。

③ 约瑟夫·布罗茨基“以赛亚·伯林颂词”，见阿·马加利特与埃·马加利特（合编），《以赛亚·伯林生日庆典》（伦敦，1991），208页；又见所罗门·沃尔科夫，《与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对话》（纽约，1998），230—1, 268页。

起话来则有着年轻的梅纳德·凯恩斯的活泼与自信。^①伯林个性中的所有层面都显现于他的声音之中，这在他发音习惯的变化中得到表现。在他最早的那些演说中，他的声音是对牛津上层阶级语言的俄式模仿，全是闭唇音和清脆快速的元音，他不自觉地受到了三十年代的完美典型，他终身的朋友和对手莫里斯·鲍拉的影响。他的老朋友们像乔治·韦登费尔德，则还从伯林抑扬顿挫的急促语流和匆忙的节奏中听出一些大卫·塞西尔的风格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英国前后两代广播收听者们认为是牛津知识分子的声音的，实际上却是一个里加犹太人对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的无意模仿。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所模仿的这种声音逐渐变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现在，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他的俄国旧习重新抬头。老式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的响亮声音又在他口头出现，语速缓慢下来，从急促含糊一变而为轻声低语。

他说起话来简直会让打字员和速记员们无计可施：似乎完全没法把捉，没有停顿或句点，也没有段落。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的低语中自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精确。其实始终有句子，也有段落。即使从句带出的插入语表面上似乎没完没了，但在思想陈述的最终完成之处，它们实际上就结束了。其间虽有限定语错综盘绕，但每个句子的主干却总是清晰的。这种秩序带有音乐性，与其说它是逻辑的，倒不如说是直觉的和联想的更为合适。他这种跳跃飞奔的说话风格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他一边陈述自己的主张，一边预想着各种反对意见和限定条件，于是就把命题和条件综合到一起，在同一个句子里同时进行表述。因为他所有的

^① 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集》卷5（伦敦，1991），410—1页：“与以赛亚争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简直聪明得过了头的人，就像梅纳德年轻时一样，是个教授：一个激烈的犹太人。”

作品都是用口述的方式写成，所以他作品中的语言风格和他的说话方式是一致的：都是华赡精细，有前人遗风，同时又不失深刻清晰。从他在学校的作文来看，他从十一岁起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风格。

不善辞令的学者们在越过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天堑时，总不免一番挣扎；对伯林而言，语言和思想则是相携而行，无有窒碍。他对自己的这种轻松自如感到怀疑，总觉得拙于言辞的知识分子可能更为深刻，更值得信任。不过他的挥洒自如乃是他的一个秘密。对伯林来说，词语总是招之即来，在他脑海里以与说话同样快的速度组成句子和段落。自有浪漫派以来，思考就一直和孤独、苦闷以及内心分隔联系在一起。对于他，思考则意味着智慧、讽刺和愉悦。

要像伯林这样热爱思考，就必须是既敏捷又合群的人物。他憎恶独自思考，并视之为畸形行为。在他看来，思考与交谈、对话中闪现的灵感火花以及调侃、躲闪和游戏都是密不可分的。伯林的长于言谈是很出名的，因为他不仅机警敏锐，而且更能让人觉察到思想是通向未知的一个突破口。与他交谈过的人们记住的并非是他说过的话——他不是智者，也没有说过什么警句——而是被他带入他的思想客厅的经历。因此他的谈话从来就不是表演，他并不借此哗众取宠，而是通过谈话来过群体生活。

伯林总是说自己“丑得让人无法忍受”。当然，他的脸虽有一种高贵感，但确实称不上英俊。不过岁月使得他瘦削下来，渐疏的头发日益灰白，双眉、富于表情的鼻子以及有力的脸颊和下颌线条越发突出。如果他不缩着嘴唇，皱着眉，或是做出不赞成的嘲弄神情，他的脸部轮廓就是精细而饱满的。伯林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就好像他一直就该是这样，就好像他整个一生都是在朝着这种希伯来式的智慧外表变化。但这样的结果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无

论他的观念还是气质在老犹太人中都是最不希伯来式的。

到目前为止，他的衰老还不怎么严重，但正在变得日渐迅速起来。他现在肩膀弯垂下来，背也驼了。他的听力也不如以前了：他发现，在全灵学院进行公开选举用的那张铺着粗呢的长桌旁边，要听懂人们七嘴八舌的谈话变得困难起来；大型宴会变得像是考验，但音乐会仍然一如既往地给他和妻子艾琳带来欢乐。每场演出都在他脑海里按照由近及远的顺序详细地记忆存档，直至三十年代的萨尔茨堡，皇后大厅，废弃已久的礼堂和早已故世的表演者——肯普夫 施纳贝尔 所罗门 利帕蒂。

以头脑的敏锐著名，就意味着朋友们都提防着他（他自己也提防着自己）出现任何迟钝的迹象。他觉得自己的头脑每天都在不断地衰退。他会说：“我什么也想不起来。”然后，仅仅为了赶走自己的恐惧，他会重新开始努力回忆 1932 年 8 月萨尔茨堡一场节日演出中一位指挥的名字（“等一下，等一下，想起来了。”）他的记忆力极为奇特，细密得简直不像是属于人类的，回忆起自己的过去来不费吹灰之力，以至于他给人的印象是什么都保存了下来，什么都没有丢失。

伯林总说他觉得自己一点儿也算不上是个有趣的人。这无疑是个狡猾的谎言，因为他最好的故事中许多都是关于自己的。不过，事实上他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一个热衷于自己想法的人，毋宁说是一个自足的人。虽然他只是以一种好奇的而非格外热切的方式倾听别人的话，虽然这种倾听更像是他自己的话语之间的停顿，但他确实是在听，而且似乎确实听见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他那些主张行动主义的朋友们常常批评他对内在体验比对献身公共事业更感兴趣。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对人类自欺行为的多样性比对 *realpolitik*（德语 现实政治 强权政治的委婉语）更好奇。

伯林惟一明显的自恋形式是他的疑病症。他喜欢生一些无关

紧要的小病。他对医生、摄生法和疗养院十分喜爱，只要受一点点刺激就会上床休息。学生们还记得他在床上给他们上课，被子上到处是书、纸、茶杯和饼干。在他妻子的房间隔壁那张他现在睡的小单人床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排药瓶、药膏、盒子和玻璃水杯。他会对你说他自己情况很不好，但实际上身体的疾病让他获得了几乎是完全的特权。不管是在这方面还是在差不多其他任何一个方面，他的运气都让人羡慕得发疯。就好运是改变人的生活的一个真正范畴而言，伯林可说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之一。

写回忆录的想法使他十分慌乱。“决不。”他一边说，一边像喜剧结尾时那样耸耸肩。而且，他害怕自己的坦率，不愿将自己的一切原原本本形诸文字。可是他的朋友们却说，如果不是由他来写自己的生活的話，那么又有谁能够在他的部分谈话消失之前将之记录下来呢？这便是这本书于 1987 年 9 月开始写作的缘起。我并非他以前的学生或养子：他似乎生来就没有父性本能。我一开始只是去那儿和他见面。我一小时一小时地记录下他的谈话，如同一个提着桶去泉边汲水的仆人。我们在一起合作了几年以后，伯林同意我写一本他的传记，并决定在自己身后出版，他一个字也不看。他的说法是：“Après moi le déluge.”（法语：“在我身后任凭洪水滔天。”这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临终时的遗言。——译者注）

我在下午来阿尔巴尼的习惯持续了整整十年。在他不断的低语声中，放在矮咖啡桌上的打字机也加快了杏仁在罐头里的碰撞声，并且记录下了壁炉上法国大钟的整点鸣声。我提一个问题会让他漫无边际地讲上一个小时，讲述着、重复着那些老故事，穿越数十年的时间，提起些显赫的人物，他也在无名之人身上逗留，高兴地向自己证明并没有忘记他们。我雄心勃勃地想要将他所有的经历——确切地说也就是每一封以前的信、每一张公共汽车票、每

一个还记得的笑话和每一句评论——都干脆利落地囊括在一个故事中；一旦经过精心的加工和润色，道出其中的关键，这个故事就可以从他头脑中迷宫般的档案库里清理出来，从此免于光阴的毁坏。这需要表现出艺术鉴赏家与遗忘作斗争的巨大才智。

同样的故事我听过很多遍，似乎这样的重复就证明了他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穿透了它那些最阴暗的角落，也驱散了它的阵阵沉默。而他之所以从未写过自传的原因也变得明了起来：因为他的这些故事已经获得了成功，它们既保存了他的过去，又使他可以免于反省。

他对自己的过去就像对自己的疾病一样，表现出一种典型的俄国式的坦率态度。只要我懂得如何发问，他就会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告诉我。他允许我阅读他的信件，这些信都和他的谈话一样自然而然。他既不惜笔墨，也不吝时间。在给俄勒冈一个无名研究生的信中，他可以详细解说自己对两种自由观念的区分，其兴味不减与小阿瑟·施莱辛格津津有味的闲谈。在这样无休无止的流畅的言语之流中，伯林似乎诚恳地相信自己几乎无论跟谁都能够以一种私人的态度进行交往。

他对待性和自身失败的态度也十分直率；对朋友则更不止是襟怀坦白。他喜欢把自己的成功——教授地位、骑士头衔、荣誉勋章——都归因于人们对他的能力的整体性高估。而且，他还总是说：“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自我贬低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其实也是对批评来个先下手为强。每当人们追问他的思想纲领时，伯林至多会说：“在学术上，我就像是一辆出租车。人们打个手势，我就停；人们给我一个指定的目的地，我就走。”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有许多文章的确都是机会和环境的需要，但他只接受那些符合自己既定路线的任务。毋庸置疑，他还是有自己的路线的，当他走完了这条路线之后，就形成

了一套独特而连贯的著作体系。如果用他那个著名的区分方法来划分的话，他的作品覆盖面之广可能使他显得像是一只知道许多事情的狐狸；但实际上，他却是一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本书的目的之一也在于阐明这件大事到底是什么。

要想知道一件大事，伯林就必须把握住自己身上的几条主线。兼有三种矛盾的身份——俄国人、犹太人、英国人，他将这三者编结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他本来有可能会对自身的某个部分加以压抑。为流亡生涯所迫，许多人确实通过压抑他们自己的某个部分才得以生存下来。但他却从没有压抑过自己，而是允许自身的所有要求都得到满足，并因而形成了一种宽容的性情，这一点也许和他的作品同样重要的一项遗产。

人们常说伯林的镇定和自由主义主张都是特权的产物。他一直十分幸运地过着优渥的生活——宠爱他的双亲，并未给他留下任何伤害的流亡生涯，二十三岁即入选全灵学院，并与一位有才智且能给他以支持的富有女子结婚——这一切使得他有可能展现出某些在其他人身身上常常受挫的东西。但我们也得承认，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情；如果换作别的人，则很可能会白白浪费这些有利条件。在伯林的性情中有某种难解的健康与安宁之源。他在自己所处的地位上游刃有余，世事练达，即使在步步逼近的死亡面前也仍然安逸自得。这种近乎冷酷的平静在我眼里显得神秘、难以接近，也无从获得；在我们共度的那些下午，这一点是我最希望能够理解的。做一个知识分子常常意味着过不幸的生活，因此他的幸福是一项值得探究的成就。

有一次，他问我：“你希望自己能永生吗？”他的母亲活到了九十四岁。我的回答是这种念头让我充满恐惧。他听我说完以后，说：“我的朋友们都这么想。可我不一样，我希望自己的生命永无休止。为什么不呢？”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见过伯林一次，事后

他评论说，伯林看上去就像是“上帝的巨大但是一般来说不怎么吸引人的剧院里的一名观众”。^①他对生活在这个剧院从未厌倦过，并且想像自己永远注视着聚光灯下的舞台。

在我们共度的那些日子即将结束之时，他经常陪我一块儿出去。我帮他穿上外套，这时他总是先把残废的左臂伸进去，再一耸肩，把衣服甩到右边。他把一顶褐色的软顶浅呢帽猛地往头上一扣，将雨伞挂到右臂上，就这样出门来到皮卡迪利大道，进入众人的目光和噪音的包围中。他习惯用脚跟的后部着地慢慢地走，两脚成绝对垂直的外八字，脑袋不停地转来转去，不放过眼前逐渐展开的场景中的任何一个细节。“看，”他会这么说一个背着背包大步流星地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浅色头发的魁梧女子，“她肯定是个挪威人。白得可怕。”他会停下脚步，以一种友善的好奇态度仔细审视柯丁斯男装店里的雨衣，打量那些黄绿相间的厚实的灯心绒灯笼裤以及其他的乡绅式外衣。他会在经过梅里迪安饭店门口时瞅着一位美国商人。要不是长着一丛精心整理过的长长的上翘的褐色小胡子，此人的脸就会像二十世纪后期的人们一样毫无表情、平淡无奇。当这个商人走得再也听不见我们说话以后，以赛亚就会把手拢在嘴上，像演员在舞台上对观众煞费苦心地高声耳语那样说道：“多奇怪的胡子！”然后再自言自语般加上一句：“生活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在皮卡迪利马戏团那儿分手，他前往位于蓓尔美尔林阴道上的雅典娜神庙俱乐部，去和一位想听他讲讲与安娜·阿赫玛托娃共度的那一夜的俄国学者一起喝茶。在贩卖色情杂志、塑料仿制伦敦警察头盔和成堆的《标准晚报》的报摊前我拥抱了他。伯林后退一步，嘲讽地朝我鞠个躬，然后轻快地转身离开，他在两辆出

^①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致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1952年3月12日。

租车之间闪避前行，将雨伞指向川流不息的车辆，让它们停下来，一边无声地对自己吹着口哨。

2 里加,1909—15

在以赛亚的记忆中，他的出生地是以两具斯芬克司像为背景的。这两座向后倾斜的石膏像长有爪子和突出的胸部，戴着法老头饰，像门神一样立在阿尔伯特街公寓的入口处。它们现在还在那儿——因潮湿而长满了苔藓，并且由于年深日久而有些破碎——守护着通向阿特努沃公寓街区的入口，1909年6月6日，以赛亚就出生在这所公寓的四楼。^①和世界上所有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以赛亚出生在他父母的床上，旁边有一位德国医生兼护士照料。他出生时父亲也在外面的镶木地板上踱来踱去，氯仿的气味溢出门外。

他能活下来算是幸运。在忙碌了几个钟头以后，为他接生的德国医生一边说“你们想知道他的名字吗？他叫‘啊哈’”，一边用镊子夹住婴儿的左臂，狠狠地把以赛亚拽入了这个世界，由于用力过猛，左臂的韧带遭到了永久性的破坏。

以赛亚不是头生子。他母亲在1907年曾经产过一个死婴，医生告诉她以后再也不能生孩子了。因此，他的父母在迎接他的到

^① 我于1991年来到里加，我想感谢拉脱维亚犹太文化协会的马戈·维斯特曼在大屠杀前对重建里加犹太社会所作的帮助。又见《里加犹太史片断》，1991年拉脱维亚犹太文化协会博物馆及资料中心出版。有关伯林家系的细节以及他在里加的早期生活主要根据伯林本人的记忆。根据对伯林的访谈，见沃尔夫森学院亨利·哈代的伯林档案，1988年10月20日，1989年10月11日及1990年9月27日。

来时不免怀着看到奇迹出现时的惊异。这些情况——死于母腹中的姐姐、双亲长久以来愿望的实现、出生时的受伤、身为独子——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虽然要对这些情况的意义作出解释并非易事。以赛亚自己从不喜欢对它们进行诠释。但《圣经》中有一个故事也许可以视为对他的人生开端的间接寓示。那就是哈拿的故事。这个不能生育的女人去庙里祈求一个儿子，她狂热得让大祭司以为她发了疯：“她的灵魂浸于愁苦之中，一面向主祈求，一面痛哭流涕。”在绝望中，哈拿起誓：如果上帝肯赐给她一个儿子，那么她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她的信仰——她那对孩子原始而强烈的渴望——最终获得了报偿。她和丈夫以利加拿有了一个孩子，他长大以后就是先知撒母耳。^①以赛亚的母亲穆萨·玛丽·伯林被这些诗句和它们所包含的希望而深深打动，因为它们直接触动了她自己的绝望之情：失去了一个孩子，又被告知再也无法生育。当医生做出这一判决时，她已经二十九岁，要算是相对高龄的产妇了。不难理解，为什么每当伯林想起哈拿绝望的信念之时，他的眼中就会充满泪水。

在看电影或是引用葛底斯堡演说的时候，以赛亚很容易流泪。尽管如此，他对自身的真实感情却十分注意。在回忆起他母亲的时候，他既对她坚强的性格保留着某种类似敬畏的感情，又混杂着因她对自己加以管教时那种潮水般强大的力量而引起的不满情绪。对于里加，他近乎漠不关心。这或许是因为他呆在那里的时间离现在实在太遥远，也可能是因为它太过拉脱维亚化了。在他心里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怀旧情绪，而且虽然身为流亡之人，他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落感。童年时代的歌谣和流行歌曲他现在仍然可以信手拈来，用一种音乐般的低语愉快地唱出来。但并没有太

^① 《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上第1,2章。

多的东西让他流露出哀惋和伤怀，过去并未给他留下痛苦的痕迹。

六岁以前，以赛亚一直住在阿尔伯特街的公寓里。他的家庭女教师是拉脱维亚人，她常常用学步用的扶手索带着他出去，从那两具斯芬克司像之间穿过，沿着街道走到公园（大家称之为游憩场）里去，克里木老兵们在那儿一面晒太阳，一面回味英克曼和塞瓦斯托波尔的生活。里加当时是沙俄帝国利沃尼亚省的省会。俄国沙皇在这里的势力代表包括一支驻军、一支骑兵特遣队、一座新建的东正教大教堂，以及一个由办事员和抄写员组成的小小的行政部门，其中除了全体职员还有一帮侍从和一辆马车，统统由一位地方长官率领。俄国人几乎没有改变里加过去作为一座中世纪商业同业公会贸易城市的身份，德语在这里仍然是文化和商业中使用的语言。这儿有一个交易所，主要由讲德语的商人们操纵，还有一座柯林斯式的德国歌剧院。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年轻的瓦格纳曾担任里加交响乐团团长，而布鲁诺·瓦尔特于 1900 年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指挥生涯。在 1909 年的里加 俄语是官方语言 但俄国人的数量却很少；人们在街上听到的语言除了德语之外，还有拉脱维亚语和意第绪语。

在沙皇统治下的里加，位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是波罗的海贵族和讲俄语的德国人——科尔夫、本肯道夫、凯泽林、布德伯格等通过效忠彼得大帝及其继承者们而建立起来的家族王朝。他们拥有当地的大片地产和城里的豪华住宅。在他们下面是交易所里的德国商人和外国木材商；然后是犹太商人和各个阶层的犹太手艺人；再其次是住在红色德维那贫民区的犹太工匠。在社会的最底层是拉脱维亚人：未脱农村习气的刚进城的农民们。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却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被剥夺了公民权。在里加，他们充当着家仆、苦力和家庭女教师。

阿尔伯特街位于里加新城，和中世纪商业同业公会时代的老

城区里那些铺着鹅卵石的街道隔着一条河，在巴黎风格的阿特努沃公寓住宅区内。谢尔盖·爱森斯坦的父亲——一个改信了基督教的里加犹太人——曾经设计过这些社区中的一部分，而爱森斯坦本人则是在里加度过他的童年时代的。^①在里加新区中设有犹太学校，但这里并非专门甚或排外的犹太社区。

里加位于殖民界限以外，亦即不在沙俄帝国西部及波兰诸省范围之内，这些地方自从十八世纪末分割波兰以来就制订了限制犹太人进入的法令。^②只要他们安分守己，里加的犹太人就可以免受沙皇治下那些歧视性条款的限制，例如禁止他们拥有土地，从事某些特定行业，改用教名，以及禁止犹太人进入高级文科中学和各大法律系等。^③

即使是当伯林一家搬到其他地方时，也没有受到过任何禁令的限制。以赛亚的父亲是第一同业公会的一位商人，多少也算个精英人士，在帝国中享有荣誉公民权，不受那些适用于次等犹太人的法律的限制。他们一家人可以在帝国各地自由旅行及贸易。曼德尔·伯林的锯木厂和木材场则坐落在犹太人贫民区内，雇用那里的工人，对于这个出生在两座斯芬克司像之间的孩子来说，贫民区仍然是 *terra incognita*（拉丁语：未知的地方）。

伯林的文件中有一份 1946 年 3 月的八十六页手稿^④，以细长的笔迹写在一本会计用的副本上。在这份文稿中，以赛亚的父亲

① S.M. 爱森斯坦著，《不朽之回忆 我的自传》（伦敦，1986），26 页；玛丽·西顿编，《S.M. 爱森斯坦》（伦敦，1952），17—30 页。

② 曼德尔·勃贝，《拉脱维亚犹太人》（特拉维夫，1971），243—61 页。

③ 《犹太文献与文物百科全书》第 14 卷“里加”条；H.D. 洛，《历代沙皇与犹太人》（库尔，1993），85—101 页。

④ 曼德尔·伯林“自传笔记”，1946 年 3 月 11 日亨利·哈代转录，伯林档案，沃尔夫森学院。

吩咐他恢复与他们一家在里加时的旧交的联系，其中包括本家亲戚，沃尔什沃诺克和施内尔森这些家族，以及俄国犹太人中的拉比、学者和商业巨子们。我曾经问过以赛亚是否知道他父亲的回忆录，结果他完全想不起来了。

从照片上看 曼德尔·伯林是个短小精干、略显矮胖的人 穿着做工精细的三件套，胡子剪得很短，头发有些稀疏。在以赛亚的记忆中，父亲是个和善、聪明而又胆怯的人，被他容易激动的专横的妻子所支配。革命前他在里加做木材生意，革命后则改行买卖猪鬃。他一生的爱好不是犹太法典或圣歌，而全在于他的妻子和成功的儿子，以及法国喜剧和弗兰茨·莱哈尔的轻歌剧。

从以赛亚的这些回忆看来，他的父亲是个被同化了的欧洲商人，只是偶然地被命运生为犹太人罢了。但曼德尔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描写却并非如此。曼德尔于 1883 年出生于沙俄治下波兰境内的维捷布斯克省佩尔市。在回忆录中，他追忆起自己在那座城市时虔诚和渴盼的心情，也说起他的祖父——一位茫茫然专注于精神世界的拉比——如何把有生之年所有清醒的时间都用来研读圣书。曼德尔还记得自己每当晚上从希伯来学校回家，路过那儿的波兰天主教堂时，就会绕道而行，以免衣服偶然碰到教堂的墙。他也记得希伯来学校里令人昏昏欲睡的课程，记得每次忘记希伯来字母时拉比就戳他一下作为提醒，记得在犹太教堂里穿戴的长长的、丝质的黑色卡夫坦（一种有腰带的长袖衣服——译者注）和绣花无边便帽，也记得公羊角吹出的哀鸣。所有这一切让我觉得曼德尔的童年时代距离传统犹太世界要比以赛亚更近一些。

在我的催促之下，以赛亚读了他父亲的回忆录。读过以后，他像是给一篇大学生的蹩脚文章打分一样严苛地认为它完全不可靠：“纯粹是伤感的落叶归根。他这些犹太情结全都是在晚年逐步形成的。”1946 年写回忆录的时候，曼德尔六十三岁，事业接近尾

声；他已经在英国流亡了二十五年；苏联占领拉脱维亚意味着他可能再也无法重访里加；大屠杀则使他的过去化为灰烬。因此，如果说曼德尔突然觉得自己在英国一向凭附的根基虚幻不实，于是转而试图抓住自己对之怀有更深忠诚的对象，这也并不令人惊疑。

可他的儿子不吃这一套。“他与犹太传统完全决裂了。他彻底解放了 既不吃‘可食’（犹太教义认为清洁可食的食品——译者注）也从来不去教堂。”当我指出他的父亲在回忆录中因为他不读犹太法典而对他略有微词的时候，以赛亚就反击说：“他自己也不读。”

犹太性格可能是伯林身上一个核心的特点，不过他心中自然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犹太人，因此他父亲想要把自己的期望强加在他身上的做法让他觉得十分厌恶。在他们这个儿子出生之前，伯林一家已经升入了一个更高的世界，远离了维捷布斯克的虔诚。这种距离不只是社会上的，同时也是语言上的。曼德尔自己小时候曾经说过意第绪语，但在以赛亚面前他却从未说过。在阿尔伯特街时，他们家的第一语言是俄语，第二语言则是德语。

历史学家刘易斯·纳米耶曾经将东欧犹太人比作一块坚冰，欧洲的教化之光开始照到上面时才开始融化。当这块坚冰融化的时候 犹太世界的条条溪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同盟运动（世俗的或宗教的）——便流入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大河之中。^① 里加的伯林、沃尔什沃诺克和施内尔森等家族也被这种种欧化思潮所席卷。

伯林的母亲是沃尔什沃诺克家族的成员，在里加贫民区一个

^① L.B. 纳米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新政治家》，1927年11月5日，103—4页 重印于《摩天大楼及其他文章》（伦敦，1931）又见伯林给 L.B. 纳米耶的信，《个人印象》亨利·哈代编 诺埃尔·安南序 伦敦，1998年第2版，91—111页。